

■甲午风云·那些事（下）

丁汝昌故乡村后的小山坡上，荒草丛里，是一片夫妻合葬的墓地。墓碑上男人去世的日子都是1894年9月17日，死因皆为血战身亡，而他们妻子去世的日子都是两个月以后。在得知丈夫阵亡的消息后，北洋水师下级官兵的妻子们自杀殉节。

千古艰难威海卫

□ 本报记者 卢昱 陈巨慧

登上刘公岛，奔向北洋水师提督府，崭新的贴金门神迎面闪耀。只听府内传来叮叮当当声，记者到访时，恰逢装修，油漆味弥漫着整个府院。游走在三重庭院之间，廊庑回环，墙壁被粉刷一新，朱红的廊柱也披上新漆，焕然一新。

翻得越新，越是让人念旧。看着来自曲阜的工人们在提督府里修修补补，记者不禁想起李鸿章当年的话：“我办了一辈子的事，练兵也，海军也，都是纸糊的老虎，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？不过勉强涂饰，虚有其表，不揭破无可敷衍一时。如一间破屋，由裱糊匠东补西贴，居然成一净室。”

这位大清国的“糊裱匠”苦心孤诣经营20年，打造了手中的王牌——北洋水师。而今，水师提督府正门，悬挂着甲午年五月李鸿章题写的“海军公府”四字匾额，书法厚重，颇得益于隶、魏书，墨迹中微微透出庙堂之气。而锈迹斑斑的“济远”主炮在府后巍然横陈，直指南方海域，守护着曾经热闹一时的水师提督府，然而炮声却不再呜咽……

福州城内的白纸门联

大东沟一战，“数济远打得不行。济远船主姓黄(方)，是个熊蛋包，贪生怕死，光想躲避炮弹，满海乱窜。各船兄弟看了，没有不气愤的，都狠狠地骂：‘满海跑的黄鼠狼！’后来，济远船主不听命令，转舵往十八家岛跑，慌里慌张地把扬威撞沉了。”

上言是上世纪50年代，北洋水师“来远”舰水手陈学海的回忆。这“济远船主”便是方伯谦。

1894年9月24日拂晓，旅顺港乌云低垂。方伯谦光着脚，被一队兵丁押赴着前往海军公所后的刑场。他上身赤裸，下穿白色布裤，一路上神情恍惚。据山东史学会甲午战争专业委员会委员、北洋水师网站站长陈悦介绍，选择此时，是因围观的人不多，可以为他保留最后一点颜面。只是十分奇怪，刽子手掣取倭刀行刑，砍了三刀之后，他的首才分离。

方伯谦此时一定后悔，早知倭刀下的头颅如此坚硬，真不该临阵脱逃，躲避倭船的进攻。

“正当方伯谦挂旗往旅顺方向逃跑时，“致远”、“经远”舰已沉入海底，“定远”、“镇远”两艘铁甲舰被日军6艘包围，“来远”、“靖远”则被日方4艘快速巡洋舰死死咬住。”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副馆长王记华介绍。

“来远”舰中弹200余发，大火燃起，烈焰升腾。为防止火焰从甲板烧入机舱，轮机官兵将通往机舱的所有通风管、天窗密闭，不顾200度的高温，恪尽职守，而燃烧的甲板上，炮手们还在不停地射击。水手王福清脚跟被弹片削去，鲜血染红了经过他的甲板，他毫无知觉，等人提示，低头看时才站立不住。

两支舰队酣战到下午5时许，日本联合舰队逐渐加速，朝南方锚地撤去，黄海才渐渐平静下来。残阳西坠，“来远”舰与剩余军舰重新编队，向旅顺船坞驶去。据陈学海回忆：“‘来远’受伤最厉害，船帮、船尾都叫炮弹打得稀烂，舱面也烧得不像样子，最后还是由‘靖远’拖到旅顺上坞的。”而在这艘肋骨已烧得变形的军舰上，有许多方伯谦的福建老乡，其中就有冰心之父谢承葆。

恍然百年后，漫步在今福州冰心故居，青石铺地，假山点缀，竹影摇曳，庭阶寂寂。正是在这里，冰心从父母亲嘴里听到许多以福州为背景的故事。据冰心回忆，大东沟海战后，“因为海军里福州人很多，阵亡的也不少，因此我们住的这条街上，今天是一家糊上了白纸的门联，明天又是那家糊上白纸门联。”

“母亲感到这白纸门联，总有一天会糊到我们的门上！她悄悄地买了一盒鸽牌烟膏，藏在身上，准备一旦得到父亲阵亡的消息，她就服毒自尽。祖父看到了母亲沉默而悲哀的神情，就让我两个堂姐姐，日夜守在母亲身旁。”

大东沟海战失败的消息，在两个月后到达海军提督丁汝昌的老家——安徽巢县高林乡郎中村。据陈悦介绍，这是一个很穷的村落，他曾去寻访了丁汝昌的第四代孙子。

在这位丁汝昌后人的带领下，陈悦爬到村子后面的小山坡上，“荒草丛里，是一片夫妻合葬的墓地。每块墓碑上男人去世的日子都是1894年8月18日(注：公历9月17日)，死因皆为血战身亡。而他们妻子去世的日子都是两个月以后。这就意味着，在得知投奔丁提督的丈夫牺牲的消息后，北洋水师下级官兵的妻子们，全部选择了同一条路——自杀殉节。”

□ 本报记者 陈巨慧 卢昱

丁汝昌之死堪称中日甲午战争中最为悲壮苍凉的一幕。

困守刘公岛的他，宁死也不愿背叛大清，更不忍心让全岛军民随自己赴死。在了无希望的那个深夜，他选择吞下鸦片，以一场悲剧给威海卫之战画上句号。

然而，在这个句号之后还隐藏着一个不解之谜：身为北洋海军提督的丁汝昌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，是降还是未降，历来说法不一。在威海采访记，记者便听到了两种针锋相对的声音。

山东史学会甲午战争专业委员会委员、北洋水师网站站长陈悦表示，1895年1月25日，英国军舰“塞文”(severn)号转递来日军的投降书后，丁汝昌不屑一顾。“可到了2月11日，在内无弹药，外无援军，军心溃散，近万军民哀求活命的残酷形势下，他不得不重新检查拾起这份钧沉冤的书信。在夜半孤灯下，他写下了字字诛心的降信，又书写一封信给老上司李鸿章的绝笔遗书，然后，端起浸泡着鸦片的酒杯，一口饮下。”

“他准备去投降，但是没有完成这个手续，为的就是保护岛上近万人的生命。一个人要作出这个决定的时候是最艰难的事，那何苦又要给自己留下污点呢？我觉得，他之所以要在作出这个决定之后再自尽，是更多地把这个投降的责任揽到自己身上。”陈悦说。

甲午战史研究专家，威东航运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孙建军却发表了完全不同的看法，他认



北洋水师在外国教官指导下演练步枪操法



威海港内的北洋舰队



驻威清军

临时换上“良吏伟人”

11月7日，农历十月初十，这天是慈禧的60大寿，光绪帝率文武百官在皇极殿行贺礼，随后慈禧在众人簇拥中到颐和园是楼看戏。而历史竟有如此巧合，这一天也是丁汝昌58岁的生日，身在旅顺的他，耳畔响起零星的炮声，日军正分三路向大连湾进攻。据海军航空工程学院海军史研究所苏小东教授介绍，6天后，丁汝昌率北洋水师在旅顺周围围转了一圈后，凄凉、绝望地撤回威海。

同样心情凄凉的还有李鸿章，据李的幕僚吴汝纶回忆：“平壤之败，李相痛哭流涕，彻夜不眠，及旅顺失守，愤不欲生。”而日军方面则开始筹划进攻威海，消灭北洋舰队，扫清从渤海登陆直隶，进而围攻京城的障碍。进入1894年末，威海成了甲午战争的焦点。

历史的年轮匆匆扩散出百余圈。仲春的海湾，最先萌动的是山光和海色，藏在山光海色中的海鸥用清脆的“欧欧”声讲述着海的情愫。威海，这座城与军事结缘已久，早在600余年前的明初为抵御倭寇侵扰，取“威震东海”之意设立卫所。

“在行政区划和军事防御上，清末的威海是个极特殊的城市。”据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研究员戚俊杰介绍，威海在行政区划上属山东省文登县管辖，而从海防体系来说，威海卫布防的海、陆驻军又属于北洋大臣李鸿章指挥。

“李鸿章是直隶总督，行政管理区域主要是今天津、河北一带，他仅能调度驻扎山东沿海口岸的淮系军队，并不能直接指挥山东省军队。”戚俊杰说，大敌当前，李鸿章要想守住威海，必然要由山东省的军队互相配合。“此时，山东巡抚能否和直隶总督同舟共济，就成了事关大局的重要问题。”

“甲午战争爆发时，山东巡抚是福润。”戚俊杰介绍说，福润虽为旗人，但较为务实。1894年夏季，在扩军备战方面，福润与李鸿章配合默契，先后募集数十营新军，加强登州、烟台、威海一带沿海防御。然而，当威海筹防正在如火如荼进行时，1894年8月16日，清廷却突然发表一项重要的人事变动：福润被调往安徽，由尚未赴安徽任巡抚的李秉衡接任其空缺。

8月23日傍晚时分，新任山东巡抚李秉衡造访翁同龢府，翁同龢“留饭剧谈”。当得知李秉衡自幼在江苏生活时，身为常熟人的翁同龢生出几分亲切。一席交谈之后，翁同龢竟然对李秉衡得出了“朴实平易，兵事将才均极留意，良吏也，伟人也”的评价。

瞒天过海的河防军

如今，在残留的清代山东巡抚衙门大堂西侧，有一亩见方的池子，四周用石栏围着，倚栏看池中，沙土涌出串串水珠，大珠小珠颗颗碧绿透亮，汩汩不息，这便是珍珠泉。9月12日，李秉衡在此正式视事。海疆不靖，他无暇欣赏珍珠泉的秋景，于月底前往胶东沿海巡视。谁都不会知道，他的这次巡视，对北洋水师竟有生死攸关的影响。

“当时日军可能登陆的地带有两个，一是往烟台方向的西翼，再就是往荣成方向的东翼。”陈悦分析称，这两翼均属山东省防区。福润担任巡抚期间，曾派军驻扎威海西翼，而他突然被调往安徽，以致无暇对威海东翼进行防御布置。

智者千虑，必有一失。一旦进入冬季，威海东翼的荣成湾便成了最佳的登陆地。这里湾口宽阔，能避开猛烈的西北风；湾为泥底，适于锚碇；而沿岸起伏的丘陵，更适于掩护陆军上岸。战略地位如此重要，李秉衡对此却置若罔闻。他并没有派兵前往威海东翼，反而愚弄威海准军守将戴宗骞，要求戴宗骞从威海守军中抽调兵力，布置在烟台方向。

“威海陆军仅有数千人，防守威海炮台尚且不足，遑论外调。”陈悦介绍说，李鸿章令威海陆军专守威海，不能拔营，这使李秉衡极为不快。既然威海守军没有派出军队，李秉衡所谓“以防威海后路”的布局，最终以山东省驻威海西翼部队西撤收尾。“这样的布局，与其说是在防守威海后路，不如说是担负起李秉衡所驻烟台的外围防务，如此一旦烟台有警，这些军队可以很快收缩回烟台。”陈悦分析道。

与被重点加强的威海西翼相比，位于威海东翼的荣成一带则空无一兵。12月23日，日军派人在荣成龙须岛一带上岸侦察登陆情况。得到情报的戴宗骞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，遂派人设防。

得知威海驻军出动，李秉衡不得不顺势作了一番部署威海海翼海防的表面文章，从烟台周边的军队中调拨5营河防军前往荣成。

“看似派出援军恰逢其时，实际上是李秉衡瞒天过海的伎俩。”陈悦分析道，李秉衡所派5营河防军，名为“军”，实则是修河的民夫。山东为预防黄河泛滥，将沿岸民夫按照军队营制编组，一旦遇到水警，就集合赶赴大坝，挖土修河。无事时则各自散去，各安生业。

“这些民夫不仅没有受过任何军事训练，而且每营的人数也不满，只有300余人。”陈悦无奈地说，河防军装备的低分程度更是触目惊心，每个营300人共用一支鸟铳或抬枪，除此之外再没有任何火器，而黄县转运局里储存的大量军械，李秉衡却严禁运往前线。

一拨拨“拔丁”攻势

在去往刘公岛的游船上，记者身旁有一位戴墨镜的“帅哥”，双手后扶船舷，逸兴遑飞，赋诗一首：“大海啊，真像一碗菠菜汤，你是蛤蜊的故乡。”乐景愈欢，哀情愈浓。

1895年1月20日，农历腊月二十五，同是在刘公岛上，有两件事犹如两把刀子悬在丁汝昌头上。

那第一件事乃战场之事。当日凌晨，日军先遣舰抵达荣成龙须湾，作登陆前的最后安全确认和站锚导向。一艘触板载着士兵驶向岸边，驻守龙须崖清军开炮阻击，很快遭日军舰炮还击，扔下4门炮，清军四散溃逃。

据苏小东介绍，由于滩多水浅，日本军舰不能

靠岸，运兵及辐重上岸均靠驳力。与当初登陆花园口一样，日军没有遇到任何有效的抗登陆阻击。日军先后在荣成湾登陆34600人，马3800匹，耗时4天。

而当天，李秉衡仅令威海西翼两营兵力出动，更值得玩味的是，他在电令中还特别加注了一句诘：合戴统领步步驰应。“言下之意就是要求不要行动过于迅速，不要独立对日作战，应跟在威海准军之后前进。”陈悦分析道。

那营乌合之众的河防军全部被日军击溃，荣成县失守。冒雪赶往荣成方向的威海驻军得到消息后被迫折回，而山东省援军却全无踪影。那第二件乃庙堂之事。都察院杨颐上书朝廷奏参丁汝昌，说道：“李鸿章始终袒庇败坏海军之丁汝昌，托以经手事件未完，逗留不遣。”言官们平素对“洋务”嗤之以鼻，掣肘北洋水师发展。一旦战事迭生，他们反复催战，幻想毕其功于一役，有的提出让北洋水师突袭日本本土，甚至要组织渔船用渔网封锁日本港口，种种荒诞，不一而足。

一旦北洋水师战场受挫，言官们越发歇斯底里，把恼怒倾泻到丁汝昌身上，发起一拨拨“拔丁”攻势。据苏小东介绍，在此之前，光绪帝在言官们的鼓动下，曾5次下旨拿丁汝昌治罪，只是经李鸿章与北洋诸将竭力吁请，此事才得以延缓。21日清晨，一场暴风雪将刘公岛银装素裹，丁汝昌迈出寓所大门，一路往东行至提督府。龙王庙、码头、海潮亭，甚至连提督府前斜挂的黄色青龙红旗也已不在他的关心范围之内。

碎琼乱飞的雪花轻盈地落在了丁汝昌的脸上，心情沉重的他举头南望，茫茫大雪中的威海南炮台，形势堪忧。当天，戴宗骞移缓救急，从北岸炮台5营准军中抽调3营兵力，火速赶往荣成方向阻击日军。

“戴宗骞这么做，是因为李秉衡向他承诺山东省军队两日内可到，到时抽调兵力便能得到填补。”陈悦说，在日军主攻方向已经明了的情况下，22日，李秉衡突然通知戴宗骞，山东省军队全部停止援威，理由是：以防日军在烟台登陆，实为保护威海。28日，日军逼近威海南岸，防守威海南北两岸炮台的准军几乎全部在南岸设防，与日军恶战。两天后，寡不敌众的南岸炮台全部沦入敌手。

“在此情况下，如再失去北岸炮台，北洋舰队将彻底困死港中。要确保北岸炮台不失，唯一的希望就是山东省能派出援军。”陈悦分析道，在北路军急时，戴宗骞不得当场纠葛、派系纷争，直接致电李秉衡以救威海。

“这位山东巡抚倒也派兵支援了，但只要对威海地理有所了解便知，他所派军队既不接近已失守的南岸炮台，也不靠近急待援兵的北岸炮台。做出这样不着边际的部署，其目的无外乎是军队一旦遇警，便可迅速撤回烟台。”陈悦无奈地说，而李秉衡对上则迥异地称，援军已经与戴宗骞部分合力，此后又谎称山东省军队大都已经调往威海，仅剩一部守卫烟台。

铁码头上的戴统领

2月1日，在威海卫城望远望南岸群山，依稀看到一面面太阳旗。此时，还可隐约听到西郊的隆隆炮声。前一天夜里，寒风凛冽，当戴宗骞蜷缩睡在冰冷、黑暗的北岸炮台弹药库里时，他手中仅存的一营守军，还有丁汝昌派来200余名水军援兵，趁黑全部逃往烟台。

面对人去楼空的北岸炮台，守将戴宗骞一脸惨淡。眼下整个北岸炮台只剩下自己率领的祭祀台炮台内19名官兵。狂风恶浪中，丁汝昌乘舢板来到北岸，猝然目睹炮台内的情景，心情恶劣的他半晌无语。“以北洋舰队的视角看，威海湾北口狭窄，装备有大量大口径火炮的北岸炮台一旦资敌，火力可轻易覆盖刘公岛，其丢失危害将更甚于南岸炮台。”陈悦分析说。

最终，丁汝昌艰难地作出决定，与其资敌，不如自毁。听到这一决定，戴宗骞喟然叹道：“守是我的责任，兵败地失，还能到哪里去呢？唯有一死以报朝廷，别无他言。”没有商量的余地，丁汝昌命几名水兵一拥而上，将戴宗骞从炮台旁架走。北岸炮台残存的守军也随同撤入刘公岛。同时，丁汝昌招募奋勇的兵丁，携炸药乘舢至北岸炮台，将大炮、火药库尽行炸毁。这帮兵丁刚完成任务回到船上，日军军列而至，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北岸炮台。

如今，在威海湾远眺刘公岛，映入眼帘的首先是一条架在海上的长路，“这是铁码头，当年北洋水师操练的地方。”戚俊杰介绍说。这座120年

前用铁板钉成方柱，中间灌满德国水泥的建筑雄姿仍在，但却不无有些寂寥，铁柱已锈迹斑斑，许多贝类动物的残骸附在上面，满是久远岁月的印记。大浪猛扑到码头下的铁柱上，“哗哗哗”瞬间被挡回来，激起水花一片。

正是在这码头上，戴宗骞被当值的水兵从船上搀扶下来。身穿已抹得很脏的青面羊皮袄，头戴一顶瓜皮帽，还缠了一条手巾，面色十分难看，他对搀扶他的水兵说：“老弟，谢谢你们啦！”接着长叹一口气，自言自语说：“我的事算完了，但看了军门的啦！”是夜，戴宗骞吞鸦片自尽，痛苦弥留至深夜而逝。

“生路”在他死后

仲春时节，刘公岛上丁汝昌寓所里，他当年手植的紫藤正吐着嫩嫩的叶芽。出门东行，龙王庙东厢房内陈列的“柔远安寇”和“治军爱民”两块石碑已满是灰尘，这两碑是刘公岛绅商于1890年为丁汝昌所立。再东行，水师提督府门内，有丁汝昌后裔在现场签名售书，当问及丁汝昌的一些故事，他连连摇头，不甚了解。这位后裔可能更不会知晓，当年他的祖先在此经历的人生最后一年是如何艰难……

1895年2月2日，风雪骤停，天气转晴。当天，日军进入威海卫城，并占领北岸炮台。至此，威海陆地全失。偌大一个刘公岛，仿佛成了汪洋中的一叶在下沉的孤舟。据苏小东介绍，早在1月22日，丁汝昌即获得一个明确的消息：如威海能支持20天，外省援军尚可赶到。如今10天过去了，援军毫无动静。

丁汝昌还抱有一丝希望，决心苦撑至2月11日，但刘公岛及港内舰队已危在旦夕。日军用占领的南北岸炮台，反击舰、岛，清军伤亡惨重；日军还从海上连连发动进攻。

2月5日凌晨，日本鱼雷艇潜入港内，将“定远”舰击成重伤。6日凌晨，日本鱼雷艇再次偷袭，击沉“来远”等3艘。翌日上午，见北洋水师主力舰消耗殆尽，日本联合舰队出动23艘军舰，在南岸炮台炮火配合下，大举正面强攻威海湾。丁汝昌亲率“镇远”、“靖远”等军舰进行顽强抵御。

见情况危急，丁汝昌便决定派鱼雷艇袭击日舰，但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：北洋海军的13艘鱼雷艇和两艘汽艇冲出港外，并没有对日作战，而是全速向烟台逃去，结果不是被日舰击沉、俘虏就是搁浅撞毁。

“鱼雷艇逃跑事件在岛内引起极大混乱，北洋水师士气开始崩溃。”苏小东介绍说，当晚，水兵连不上岸，陆兵连令登舰求离岛，扬言不再作战，大批官兵齐聚水师提督府门前，哀求丁汝昌给予生路。

丁汝昌晓以大义，并表示若11日救兵还不到，届时自会有“生路”。8日，又有一批水兵前来跪求生路，洋员也劝说他投降。丁汝昌明确表示，他不但拒绝投降，而且绝不会在有生之年坐视此事。

9日，日军再度强攻，丁汝昌亲乘“靖远”指挥反击，不幸“靖远”被南岸炮火击中下沉。丁汝昌落水后被救起，仰天叹息：“天使我幸未阵降也！”当晚，冒死送信的密使将丁汝昌字泣血乞求的求援书带回烟台。“……如十六七日(注：公历2月10、11日)援军不到，则船岛万难保全。”

在盼望援军之时，刘公岛的形势更趋恶化。为免资敌，10日下午，丁汝昌、刘步蟾下令将搁浅的“定远”用水雷炸毁。当日午后，刘步蟾来到部下住处，恰好看见“定远”枪炮大副沈玉堃写下“千古艰难唯一死”七字，推案一笑，于当晚服鸦片自杀。

据时人回忆，2月10日，丁汝昌望着威海陆地方向，眼睛瞪得跟铜铃一样。而当时山东省军队主力一直收缩在登州、莱州一带。云贵援军被李秉衡截留，变成了他加强登州防御的力量。

至于援威一事，李秉衡则抛出一个虚无缥缈的计划：云贵援军再添募训练20个营，作为沿海北路援军；其他援军暂驻莱州训练，等训练纯熟，再等上从辽东撤回的援军，加上天津等地调来的军队，然后再谋划如何援威。“在李秉衡的这番貌似积极、实为掣肘的战术下，丁汝昌的北洋水师和刘公岛已经被拖垮。”陈悦说。

2月11日白天，丁汝昌在督率众舰，击退日军再度发起的强攻之后，没能盼来援军。深夜，水师提督府门前拥挤了等待最后消息的军民。时间慢慢地滑到子时，所有人都知道了结果，他们已被彻底抛弃。面对岛上“水陆兵勇万余人哀求活命”，心力交瘁的丁汝昌服鸦片自尽，兑现了予其生路的许诺——“生路”就在他死后。

14日，威海降约正式签署。17日下午4时，“康济”舰载着戴宗骞、刘步蟾、丁汝昌等人的灵柩，在汽笛的哀鸣声中，凄然离开刘公岛铁码头。

北洋水师就此覆灭。

如今，夕阳西下时，在刘公岛码头上迎风而立，碧海微澜，白滩古渡，山形依旧，寒流再枕。东方吹来的海风，吹破了大清朝300年的天朝梦，吹走了那些曾在此停泊的战舰，吹走了血泪满满的春帆楼协议。甲午年那些人和事，也已随长风而去，不知飘落到何方……

孙建军介绍，丁汝昌等人的遗体停放烟台期间，各国驻烟台领事及驻烟台的海军将领们，纷纷前往吊唁。洋人可以对丁汝昌之死表现出充分的同情，但国人却接受不了北洋舰队的“投降”。特别是京城中的一些强烈主战的书生们，不能正视战争失败这个事实，他们的愤怒需要一个宣泄的出口，需要一个责骂的对象。

吏科掌印给事中余联元于3月6日上折子，认为丁汝昌“死情有疑”，朝廷对此将信将疑，当天即命山东巡抚李秉衡就近调查。

3月28日，李秉衡提交了他的“调查”报告，但他只是根据“牛昶晒报告”做了一篇纸面文章，用两个假设荒唐地回答了朝廷的疑问，可颠预的满清朝廷却丝毫未察。

“李秉衡不肯放过死人，朝廷倒无意‘鞭尸’。虽不予议恤，也没有进一步处罚。”孙建军说，最终朝廷作出不奖不罚的裁判：“已革海军提督丁汝昌，总统海军告终俸事，前经降旨拿回，获咎甚重，虽此次战败死绥，仍著毋庸议恤。”

光绪末年，广东水师提督萨镇冰等部分海军旧属和威海卫当地绅民三百多人，联名上书直隶总督袁世凯，要求给丁汝昌以公正的评价和待遇。袁世凯于1906年7月5日奏朝廷奏《故提督丁汝昌恩开复原官原衔折》。但其时朝政混乱，朝廷也不愿意自打耳光，袁世凯的折子被“留中”不发。直到1910年4月25日，经督办海军大臣载涛奏请，登基不久的宣统皇帝才批准丁汝昌开复原官原衔。

至此，依然带着“投降”帽子的丁汝昌，如若泉下有知，或许会得到些许的安慰。

丁汝昌之死

旋勇丁、水手露刃慑汝昌，汝昌稍慰之，人舱仰药，张文宣继之，十八日晓夜四更许，相继死。”那应该如何看待这两种不同观点呢？

孙建军说：“我的观点一直非常鲜明，认为丁汝昌是先自杀，北洋海军才投降的。在切入甲午战争研究的第一篇论文中，我就从证据法的视角来审视丁汝昌一案。过去不管持哪一种观点的学者都没有从这方面论证过。我把所有当时能够掌握的证据资料进行了对比，从当时的角度来讲，说了丁汝昌安排投降活动、写了投降书的证据不足，而大量可靠的证据是指向了丁汝昌死了以后，是牛昶晒安排了投降活动。”

他表示，丁汝昌之死是研究甲午战争的坎，这个坎过不去，无论是评价人物还是评价甲午战争，都是建立在虚无的基础上，所以必须要越过这个坎。“要破解牛昶晒是否在丁汝昌死后伪造了降书，其实并不难，只要把丁汝昌的投降书做一个笔迹鉴定，那完全就解决了问题。可是，在这方面，最权威的是公安部的笔迹鉴定，费用很高，一直就没有人做这件事。我买了《笔迹鉴定学》、《笔迹鉴定理论与实践》等大量笔迹鉴定学方面的书，破除了我对笔迹鉴定这门学问和技术的神秘感，并利用这些方法分析北洋海军在投降过程中的4封降书影印件。”